

二十世纪后十几年，世界政党政治中最为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曾经长期单独连续执政的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在和未来有何借鉴？

大党的兴衰

DA DANG DE XING SHUAI

王瑜◎著

大党的兴衰

DA DANG DE XING SHUAI

王瑜◎著



二十世纪后十几年，世界政党政治中最为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曾经长期单独连续执政的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在和未来有何借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党的兴衰/王瑜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035-4614-3

I. 大… II. 王… III. 执政党—研究—世界 IV. D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4573 号

大党的兴衰

责任编辑 曲 炜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高 鹏

责任印制 王洪霞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字 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序 言

· 王长江 ·

20年前，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这个党姓“马”，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思。

其实，苏共的垮掉，只不过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世界政党政治变革大潮中的典型案例之一。在苏共出事前后，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也先后出了问题。除了和苏共垮台有关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之外，至少本书涉及的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台湾地区的国民党等等，也都位列其中。

于是，人们对大党的兴衰投入了格外的兴趣。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大党。大党的兴衰，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在和未来，有着强烈的暗示作用。也正因为此，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对大党老党兴衰史的研究长盛不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这些大党老党所经历的跌宕起伏，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研究素材。深入研究这些案例，不但对了解和把握政党政治现象的特点、规律和脉络大有裨益，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如何科学应对



大党的兴衰

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陷阱、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提供了前车之鉴。此外，这些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这座矿藏的储量非常可观。只要用心去挖掘，我们总能在一些有关改革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上获得新的、更多的认识和启迪。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瑜的这本书，就是在以往曾经共同进行的研究的基础上，调整研究的角度，充实更多的内容和资料，加强理论思考而给大家贡献出来的又一份很有质量的成果。这种深度挖掘，我是十分肯定、十分赞赏的。

借这本书的出版，我想就研究的方法论谈几点感想。

总结这几年对大党老党的研究，大略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秉承传统研究方法，主要着眼于党的性质，来分析大党老党失败的原因。第二种是从政党活动，特别是政党执政共性的角度，力图从大党老党失败的教训中总结一般规律性的东西。这些年来，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研究特点是，在不忽视与党的性质相关重大问题的前提下，更着力于从政党政治基本原理和政党发展、活动一般规律的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党的建设问题。王瑜这本书也是如此。

我无意否定沿着党的性质的思路展开分析的研究取向。我只是想借我们自己的研究经验证明，过于依赖这一路径，往往会使研究陷入困顿。

首先，它使我们难于从中提炼出政党执政都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则。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由于确立的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目标，因而在取得政权方面另辟了一条和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道路，从而政党的活动方式也和其他政党迥然相异的话，那么，在执政之后就会发现，它们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与其他政党有了越来越多的相似性。这些问题，并不因为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便不成为问题，更不因为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自然解决。既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执政过程中另辟蹊径，充分利用别的政党已有的治国理政经验来充实自己。而动辄以性质为界，先把自己从遍及全球的政党现象中择出来，无异于画地为牢，为超越自身经验上升到把握政党活动一般规律的高度设置了天花板。

其次，它会限制我们的眼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出问题当然免不了有党的性质发生畸变的原因，但略微抬高一下眼光就会看到，它是无法说明除了苏联、东欧共产党之外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何以也一个个地失去长期执政的地位的。如果说，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垮台与党的性质的改变脱不了干系，那么，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状况恰恰说明，政党衰落还有不由性质决定的更根本的原因。其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好，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好，都不过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你起到了这种工具作用，民众信任你，你便得到信赖，得到认同，便有了掌权的资格。你失去了这种作用，甚至变成了一个自我服务的既得利益集团，你便没有了资格，纵使把党的性质强调得其他政党难以企及，也是无用。

再次，它会使我们流于空谈。从性质着眼来考察政党活动，确实能帮助我们很快抓住问题的本质。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种分析也使我们有了固定的套路。按照固定的套路展开分析，固然既有现成的逻辑，又最省力，却往往停留在大而化之、大而无用的结论上。譬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是我们从党的性质出发总结苏共失败教训必定少不了的结论。这些道理都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明知不坚持会遇到风险，苏共东欧党却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对这么好的东西，它们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些结论无法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了那么多年，花费了国家那么多的资助费用，反过来倒过去还是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的话，恐怕是应当心怀愧疚的。

最后，它还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得出似是而非的认识。讲到性质的变化，总会有一个变化的起点。这个起点，对一个党来说，往往就是领导人。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党，因为党内出了“叛徒”、“修正主义”，便土崩瓦解——这样的观点曾经盛行一时。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个别领导人在大党老党失败中的关键作用，但却不能本末倒置地把它认作最根本的原因。我记得恩格斯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



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他还教导我们：“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① 160年前的这段话，即使拿到今天，也真的可以说是精确、精辟、精彩绝伦。

对大党老党经验教训的研究，仍然潜力巨大，未有穷期。相信王瑜这本著作能给我们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深刻的启示，当然也期待出现更多高质量的成果。

2011年6月写于中央党校

（王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

第一章

苏联共产党： 一个大党的衰亡

2011年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苏联解体20周年。在20年前即1991年8月24日这一天，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一项艰难但却是诚恳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员和地方党组织将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①第二天，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至此，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大党老党，宣告了自身命运的终结。亡党必然亡国。同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独立国家首脑会议宣告苏联解体，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停止执行苏联总统职务。一个超级大国就此消亡了。更为可悲的是，在苏共宣布解散的时候，当时的2.5亿苏联人、1500万苏共党员异常平静地接受了。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苏共，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苏联解体后，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政治中心、9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及大量银行存款，在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时，没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工人、农民乃至苏共党员都没有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苏共政权。人们为苏共举行了一个静悄悄的葬礼。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

^①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3页。



牺牲来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20 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然而，它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无法抹去的。人们还是在不断探究：一个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宣称为人民谋利益，并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党，何以在它执政 74 年后遭遇亡党亡国的厄运呢？有个统计数字大概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 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 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 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机关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竟高达 85%。^①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甘愿流血牺牲，为人民谋幸福的党蜕变为一个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党呢？我们可以从苏共执政的历程中去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列宁时期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探索

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党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区别究竟应该在哪里，究竟应该如何建设一个执政党，这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面对的，而且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实践证明，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环境、地位和任务的变化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就明确指出：“现在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要求苏维埃政权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说，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② 显而易见，列宁已经认识到，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作为执政党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建立政权之初，列宁就开始积极

^① 王长江著：《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5 页。

思考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并逐步阐明了关于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加强党的领导，由党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同时要党政分开，党领导苏维埃，但是不能代替苏维埃；执政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根本任务”、“最主要任务”；充分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经常纯洁党的队伍，不断提高党员素质，等等。

列宁所揭示的这些重要原则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仍然是适用的。但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去世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主客观条件都使列宁无法深入探讨究竟应该如何建设一个执政党的问题。正是由于一些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没有澄清，列宁时期苏共在党的建设上有很多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包括：

（一）党究竟应当如何领导国家

党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列宁早期对国家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认为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在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人民管理制”、“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他在1918年俄共七大上明确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①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选拔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和士兵进入国家机关，并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

但是，实践越来越表明，在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俄国，由所有人都来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不现实的。因此，在1919年俄共八大上，列宁又指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②这表明，苏维埃俄国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现实决定了要由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在实践中，布尔什维克党承担了大量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成为整个国家机器的核心。苏维埃和社会团体等成为党的机关的下属。列宁也明确强调：“我们的党是一个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①“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②

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之初，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此，列宁也有所认识。例如，列宁就曾经批评道，对外贸易委员会甚至不敢决定是否从国外购买一批罐头，而是要等政治局做决议。所以，1919年3月俄共八大曾试图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自职能。决议明确指出，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③1920年3月，俄共九大重申：“党组织绝不应当代替苏维埃，……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都应当通过相当的苏维埃机关来进行。”^④1922年3月，列宁又进一步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⑤然而，关于党和苏维埃各自的职能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列宁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阐述清楚。掌权后的共产党并没有认识到国家机器有可能成为超越社会的力量，需要打造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保障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的控制。^⑥这就造成在实践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

（二）党如何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

列宁确立了新经济政策，认可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合法地位。对这种情况下的党的作用，列宁的认识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页。

⑤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⑥ 王长江著：《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作为地下党活动显著特征的极端集中制比以前更有所加强，因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①为此，列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

第一，整顿党的队伍。为了防止大批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布尔什维克党员一方面规定了包括延长预备期在内的严格的入党条件，另一方面发起了清党运动，清除已经进入党的各级组织的不良分子。1921年8月—1922年3月的第一次清党中，共有近16万人被除名，占党员总数的24.1%，这里面还不包括3个省级地方的资料。

第二，赋予中央委员会开除自己委员的权力。《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第7条规定：“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执行。”列宁之所以建议在决议上写上这一规定，是因为看到了党内存在分裂的危险。但是，列宁也认识到，这条规定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为中央委员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才有权开除中央委员。为了把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列宁同时建议不公布这一条文，“我们建议不公布第7条，是希望不用这一条”。^②但是，中央委员会有了开除自己委员的权力，无形中扩大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存在着中央委员会凌驾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倾向。

第三，党中央的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后，随着中央委员会人数的不断增加，党面临的任务的繁重和复杂，由中央委员会集体决定各种日常事务也就越来越困难。1919年3月，俄共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并规定政治局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作政治决定，处理日常政治问题。这三个新机构的设立，一方面分解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造成党内权力向政治局集中。在八大以后不到4年中，列宁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就有296次，共处理和决定了2851个问题。列宁在俄共九大做工作总结时说：“政治局解决了所有一切有关国际、国内政策的问题。”有些具体的政务也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三）如何发展党内民主

列宁本人是遵循党内民主的典范，而且十分看重党内民主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列宁时期，党代会实行年会制，发挥领导全党的作用。在十月革命后每年春天，即便充满战争的腥风血雨，都照常召开党代表大会。大会的开法体现了党内民主。大会议题在会前就会向全党公布，由《真理报》出版“争论专页”，允许发表各种意见。会上允许反对者作副报告。例如，俄共七大的议题是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多数作正报告，主张签订这个割地赔款的条约，以利于建立红军，增强国防实力；中央委员布哈林则作副报告，以丧权辱国为由反对签约。经过大会争论后每人一票平等表决，少数要服从多数，多数要尊重少数。结果，列宁意见获得多数通过。会后几个月内出版大厚本的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让全党全国都知道大会详情。

在列宁的倡导下，1921年俄共十大历数了战斗命令制和极端集中制的种种弊端，决定以工人民主制代替极端集中制，以使所有党员都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① 十大决议规定：“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要定期、公开召开，并使之制度化；党内经常开展有关全党一切重要问题的讨论等等。但是，在实践中，列宁的这些构想很多都没有落实。例如，广泛实行任命制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如1922年党中央就实施了1万多项任命，其中有一半涉及到负责干部。

由此可见，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党执政后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党的建设必须与党的执政地位相适应。列宁所指出的执政党建设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党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到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党的转变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有很多理论和认识问题亟待解决。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页。

二、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共党建模式的主要弊端

列宁之后，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坚持了列宁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比如，斯大林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干部管理制度。但是，党内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也使斯大林犯了绝对、僵化、教条地对待列宁思想的错误。斯大林在把列宁的基本原则、不确定的思想和临时措施都作为绝对真理继承下来的同时，忽视了列宁思想中最为宝贵的东西，即探索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这样，在实践中，党内变得高度集权而又极度缺乏民主，逐渐形成了一套僵化的体制和党的建设模式。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曾经试图汲取斯大林时期党的建设的教训，对党的建设模式进行改革创新。赫鲁晓夫的一些改革是值得肯定的，如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干部任期制和更换制度，对于冲破干部职务终身制、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有一定意义。但是，赫鲁晓夫把苏共党建的弊端都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因素，因此，他不仅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未能触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的建设模式本身，而且其改革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1962年改组党的组织，按生产原则建立工业党和农业党；在干部制度改革上换干部过勤，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领导职位后，合并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重新按地区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并且设法剔除了这一模式中比较极端的部分。但是，勃列日涅夫血管里流淌着斯大林体制的血液。于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建模式经过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逐步完善、成熟。从此，苏联走向衰退。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由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虽然在继任总书记的这段时间里，安德罗波夫树立起了改革者的形象，口碑甚佳，但是，安德罗波夫在执政15个月后就去世了，他的改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根本无法触及到党建模式中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接任总书记的73岁的契尔年科，则是斯大林模式的积极维护者，而且也只有13个月就病故了。这两位领导人当政时期是名副其实的过渡时期。

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共党建模式主要有以下弊端：



(一) 经济发展战略背离了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利益需求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然而，作为执政党，苏共在执政生涯中却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提苏联经济，凡是到过苏联或是对苏联有所了解的人，眼前就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画面：一边是高耸的烟筒、大型的军工联合体遍布全国，另一边则是商店里空空的货架；一边是广袤无际的肥沃土地，另一边则是人们排着长队在食品店抢购食物；一边是加加林早在1965年就幸运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飞向太空，另一边则是直到苏联解体前，老百姓喜欢的羽绒服、牛仔裤、旅游鞋之类的物品，要靠中苏两国大大小小的“倒爷”们才能得到，甚至连孩子们喜欢的泡泡糖和自动铅笔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提供……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邓小平说得也十分精辟：“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必定会出现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苏联人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失落，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道理没有讲透，而是人民的生活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失望，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是从排长队开始的。

而这一切是与苏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相连的。苏共执政后，在党的战略思想的转变中，形成了重政治、轻经济，经济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的局面。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和苏共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在反思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中，都谈到这个问题。雷日科夫总结说：“现实生活中很难把经济与政治分开，但是，我们这里跑在前面的总是政治。”^③利加乔夫则说：经济一次次地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③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政治，“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① 为了政治的需要，人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不断地受到压制、甚至牺牲，人民要为国家的强大忍受一切。

为了使自己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超越对方，苏共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共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从斯大林时期就提出来了。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宣布：苏联过渡时期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过了两年多，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又宣布，苏联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前进。战后的1952年，当苏联还是满目战争创伤、百废待兴之时，苏共十九大又提出：“要通过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明确提出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又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1986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

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便不顾国情地制定赶超战略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为了实现这些高指标，便自上而下地层层搞强迫命令。下层则以浮夸风、弄虚作假来回应。其结果是给经济建设、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例如，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要在三四年内使苏联肉类产量超过美国的决策目标。从当时苏联肉类生产的实际能力来看，赫鲁晓夫提出的目标根本就不可能达到。但是，这个目标却得到距离莫斯科不远的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的热烈响应和“拥护”。为了博得赫鲁晓夫的欢心，拉里奥诺夫在1958年作出保证：要在1959年使梁赞州肉类产量比1958年多2.8倍，并向国家交售多两倍的肉类。赫鲁晓夫为此大加赞扬，还让《真理报》为其宣传。为了兑现承诺、向上表功，在根本无法实现浮夸目标的情形下，拉里奥诺夫决定把农场和农庄所有肉用牲畜、奶牛甚至种畜都统统予以宰杀，但这离承诺的目标仍然相差很远，州党委一班人于是派人到临近各州去抢购牲畜。同时还荒谬地规定：所有税收都必须以肉类支付。到了1959年底，梁赞州卖给国家的肉类总算达到了1958年的3倍。于是，州委书记拉里奥诺夫一时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跃进榜样。梁赞州虽然距离莫斯科并不远，但中央竟然没有觉察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到有何异常。可是，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致使来年梁赞州的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1960年，许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破产，全州卖给国家的肉类，只达到保证数下限的1/6。硬任务没有完成，中央高层派工作组去近在咫尺的梁赞州调查了解，拉里奥诺夫一班人的欺骗行为立马曝光。拉里奥诺夫为了逃避制裁开枪自杀。

为了在军事力量上赶超西方国家，苏共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的政策，造成苏联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从1917—1987年的70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9倍，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4.5倍。另据统计数字显示：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最低限度为80%，而消费资料最多只占20%。而且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生产，约占苏联国民生产的40%。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领土大，又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在一定的时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后来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苏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苏联60%的优秀科技人员、大量的先进设备都在军工。国民生产总值的1/4在军工，70%的机械工业是与军工有关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军费高达国民收入的20%左右，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50%左右，而军费却与美国相当。据西方学者估计，如果苏联把它的军费预算削减25%的话，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的增长率几乎可以增加一倍。有人把军工企业称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吸血鬼，它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致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像利加乔夫所说：“强大的军工综合体吞食了大部分国家物质技术和劳动资源，结果阻碍了民用经济的发展和重大社会项目的完成”。^①

苏联社会主义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经济军事化必然以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为了满足实行扩张政策的扩军备战的需要，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长期以来，苏联市场供应紧张，社会主义经济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这种短缺更加严重。到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苏联人民最终厌倦了这种

^① [俄] 叶·库·利加乔夫著：《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